

那些名不副实的地名背后

有这些历史渊源



在中国的众多地名中,有很多一望便知其义的。比如山西,以位于太行山以西得名;河南,是因为大部分位于黄河以南;湖南、湖北则是以洞庭湖为界……但也有些地名,光看名字,很容易被带偏。

名里无实:北京为何有很多带“海”字的地名?

在北京这个内陆城市,有很多带“海”字的地名,如中南海、什刹海等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以什刹海为例,其名得于元代。当时的北京水系发达,如今的积水潭、什刹海以及德胜门外原有的一片水域太平湖,在元代是连成一片的,是古高粱河在南迁之后形成的天然湖泊。南方的漕粮、布匹、日用百货等经京杭大运河均可直通积水潭。在蒙古语里,湖泊、水塘都被称作“海子”。据传,元世祖忽必烈就是因为看中了这片水域,才确定以此为中心建设新城。

元朝佛教盛行,不久之后,这片水域周围建起了许多寺庙、尼姑庵以及道观,因而就有了“十刹九庵一庙”的说法,因古文中“什”通“十”,慢慢这片水域就被称为“什刹海”了。今天位于什刹海附近的广化寺、火神庙,均建成或重修于元代。至于中南海之名的由来,与什刹海大体相似。

再以枣阳为例,作为湖北省的著名历史文化名城,名字里带个“枣”字,但这里却不生产枣。枣阳,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老家,在设县前为一个村子,初次取名枣阳是在隋朝,在此之前,名为广昌县,为避太子杨广名讳而改名。至于为什么要取名叫枣阳,一说是因为当地有个枣阳村;另一说是枣阳的“枣”字由“棘”的古体“棗”字转书而来,而古代棘阳县与今天的枣阳县并不远,故此有“昔为棘阳,今为枣阳”之说;还有种说法是枣阳古时枣树众多,前人以枣树多、枣子大取名枣阳。

湖北仙桃名中有“桃”但不产桃。仙桃这个地方,从古代到近代,一千多年时间里一直叫沔(miǎn)阳,1986年撤县建市更名为仙桃。至于改名原因,有的说是因为“沔”字既不好记也不好写,就采用了当地的民间传说改为“仙桃”。

湖北文史记载的传说中,一种是和地理形状有关,因仙桃地处汉江和锦瑞河之间,地势呈桃形,明代时取名“仙桃”。另一种是谐音,唐代贞观年间,回纥使臣颉伯高,奉命携一只仙鹤赴唐朝进贡,途经沔阳境内,不料仙鹤逃遁,仓促间,颉伯高只抓住一片鹅毛。无奈,他只好硬着头皮将鹅毛进贡给太宗皇帝,并说道:“仙鹤贡唐朝,山高路远遥。沔阳鹤逃遁,倒地哭嚎啕。上奏唐天子,请饶颉伯高。礼轻人意重,千里送鹅毛。”太宗听后,就收下了这片鹅毛,并回赠一些中原特产给颉伯高。后来,人们把仙鹤逃走的地方取名“仙鹤逃”,又称“仙逃”,后来“仙逃”就变成了“仙桃”。

名大于实:山东指的是太行山以东?

除了名里无实之外,还有一种是名大于实,其代表是山东省。很多人以为,山东与山西是以太行山分界,一东一西,但实则不然。

山东作为一个地理名词、一个地理区域的名称,最早始于战国时期,当时秦人称崤山、函谷关以东的地区为“山东”,为一个地域性的泛称。1168年,金朝设山东东路、山东西路。这里的“山”,主要仍然指的是崤山。1368年,朱元璋置山东承宣布政使司,有了今天山东省的雏形,不过当时的山东,管辖着今山东半岛、辽东半岛一带,比今天大多了。清初设置山东省,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,太行山东边还有河北省的大片区域,而山东仅仅有一小部分算是太行山的正东方。

西周时期,武王去世,即位的成王年幼,靠武王的弟弟周公旦、召公奭辅政。考虑到西周的地盘太大,不好管理,周公、召公决定分而治之,分界点就是今天的河南三门峡市的陕州区,过去叫陕县。《左传·隐公五年》记载:自陕而东者,周公主之;自陕而西者,召公主之。

名实相悖:海丰的“海”味儿为何大大弱于陆丰?

众多名不副实的地名中,最具迷惑性的,

恐怕要属名实相悖。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,要属广东的海陆丰地区。

海陆丰地区,由海丰和陆丰两个地区拼合而来,是广东汕尾市的旧称,位于广东东部,汇集了闽南文化、客家文化和广府文化。这两个地名的奇特之处在于,海丰明明名里带着“海”,但其“海”味儿却大大弱于陆丰。海丰境内尽管有长沙湾、高螺湾、九龙湾三大海湾,但陆丰的海岸更曲折,港湾更多,沿海有乌坎、甲子、碣石、湖东、金厢5个港口,18个岛屿,230个海礁。

海丰是有名的千年古县,早在东晋时期即置海丰县。之所以取名“海丰”,据清嘉庆《惠州府志》和《岭南杂志》记载:“海丰,亦称南丰,以大海在邑南故云。”海丰取义于“水族甚多、南海物丰”,所以,早年的海丰县,实际上包括今天的汕尾市和陆丰市在内,拥有大

片海岸线,是名副其实的“海丰”。

陆丰原是海丰的一部分。公元624年,从海丰县划出东部地区建立安陆县,也就是后来的陆丰县。贞观年间,陆丰曾被并入海丰。到清朝雍正时重置陆丰县。1988年,海丰、陆丰两县划入汕尾市。1995年,陆丰撤县设市,属县级市,由汕尾市代管。之所以取“陆丰”名,据《陆丰县志》载:陆丰县“去古陆安故壤三十里,去海丰县七十里,乃撮举陆丰以名之,谓不忘其旧也”,即取“陆安”“海丰”各一字为名。

比陆丰和海丰地名更难理解的,是海南的东方市。东方市是海南省下辖的一个县级市,与名字相反的是,它位于海南的西南方,西临北部湾,与越南隔海相望。据考证,西汉时期即在海南岛设置了16个县,其中的九龙县大体就是今天的东方市所在

位置。隋朝时,在西汉九龙县故地上设立“感恩县”,这一名称沿用了一千多年,直到民国时期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先后成立了东方县、东方黎族自治县,1997年撤县设市,东方黎族自治县改称东方市。之所以叫“东方”,是因为在东方市东部山区的东方镇(现已改称东河镇),有三个黎族村落——东方村、中方村和西方村。“方”在黎族语言中是“村”的意思。“东方”只是黎语地名而已,它的实际意义与地理方位没有丝毫关系。

所以,每一处地名背后都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因素,不能简单从字面意思去理解和判断。也正是这一点,说明了我们国土的幅员辽阔,历史的源远流长以及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、博大精深。

本报综合消息

张居正与他的学生们

张居正作为明代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,一生桃李满园,门生遍朝野,来源颇广泛:一是在嘉靖三十二年的会试中,他身为《礼记》房的同考官,选拔出了十几位佼佼者;二是在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,他担任国子监司业期间,亲自教导一批监生;三是在隆庆五年会试,他以主考官身份为国选才,录取天下四百士,这批门生数量之众,影响之深,尤为突出。

同心同道 改革洪流中的调和斡旋

隆庆五年(1571年)春闱,张居正主持会试,招收四百门生,其中不乏海内闻名的文人雅士,如张元忬、邓以赞等,更有诸多经世济民的干才,如商为正、王象乾等,可谓桃李遍天下。

然而,这批士子在日后政治生涯中逐渐分化。刘璈、商为正、林应训、朱珽、曾士楚、傅作舟、王蔚、秦耀、钱岱、张一鲲等人,政治上较为亲附张居正,成为其得力助手;但张居正失势后,他们大多被冠以“爪牙”之名遭到清算。傅应祯、刘台、吴中行、赵用贤、朱鸿谟、孟一脉、管志道、赵世卿等人都曾上疏批评张居正其人其政,成为张居正改革的反对派,他们在江陵柄政(张居正掌权)期间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压排挤,但始终坚持自己政治立场。

相比之下,张元忬等人则尊师敬师,既不曲意逢迎,亦不悖违抗命,师生相处得恰到好处。张元忬,浙江山阴人,是南宋以来绍兴地区的第三状元,同时也是张居正同榜进士张天复之子。会元兼探花邓以赞是江西新建人,其会试卷中有“举吾身之生死利害皆不足以移之,而惟社稷之是安,乃为快耳”之语,与张居正志趣相合,故而被张居正钦点为会试第一。

张居正柄国,邓以赞时常向张居正提出匡正谏言,但谏言多不被居正采纳。邓以赞无奈之下,只得告病归乡。张元忬则周旋于张居正与其反对派之间,试图调和双方剑拔弩张的矛盾,营造相对缓和的政治氛围。难能可贵的是,张元忬始终坚守自我,保持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,不盲目附和任何一方。

万历三年(1575年),傅应祯疏陈重君德、苏民困、开言路三事,指责张居正刚愎自用,误国殃民。次年,刘台弹劾张居正目无君上,擅作威福,乱祖宗成法,把江陵柄政后第一股反张浪潮推到顶点。傅应祯和刘台都是江西安福人,也都是首辅门生。

张元忬与傅应祯交往甚密,他颇费心力,试图弥合张居正与其反对派门生之间的关系。元忬崇尚忠义,佩服傅同学慷慨言事的忠忱与不畏权贵的勇敢;同时也劝慰他不可过于激进,要设身处地,换位思考,体谅师相的艰难处境与谋国苦衷。

张元忬对老师可谓知之甚深,不同于腐儒动辄谏骂他窃夺君主威福,状元郎对主少国疑之际的国家权力分配,独具卓见。他深知若削弱内阁之权,大权可能旁落至后宫或

宦官之手,于国于民实乃大患。故而,为江山社稷、宗庙存续计,当下进言国事者,当怀谦逊之心,以委婉言辞规谏,方于君臣皆有裨益。若攻讦过猛,易引发党争之祸,吾辈皆难辞其咎。

有感于此,张元忬特意告诫身处言路的同科进士徐贞明行事当审慎,言辞应平和,不可因一时激愤而发过激之语,有伤盛世熙明之体。

清流浊浪 纲常与权柄的博弈场

万历五年(1577年),张居正父亲去世,他谋划“夺情”之局,决意留朝推进改革大业,此举引发广泛争议和抨击。张居正门生吴中行、赵用贤等人纷纷上疏,言辞激烈地指责首辅父死不奔丧,斥其不忠不孝。而张居正为保住相位,更为捍卫改革成果,不惜以廷杖、流放等威权手段镇压异议,加剧了朝廷内部矛盾和张居正与门生之间的裂痕。

张元忬作为张居正的状元门生,对此心境颇为复杂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,他一方面认为身为首辅门生应念及师生之情,上疏言事、检举揭发等事,当由他人所为;另一方面,这位状元郎对忠孝之道恪守不渝,于伦理纲常坚决维护,诸如夺情守制,挽留师相、为病情祈祷等事,他宁死不为。

夺情之事,张元忬全然站在同窗吴中行、赵用贤等人一边,佩服他们誓死维护纲常的勇气。当新科进士邹元标遭受酷刑后,张元忬联合邓以赞等人伸出援手,给予邹氏极大支持。

面对首辅夺情,张元忬在坚守纲常与师生情谊间艰难徘徊;随后的禁毁书院政策,更在士林中掀起惊风骇浪,不仅将朝廷与士林的矛盾推至风口浪尖,也使张元忬内心的纠结与挣扎达到顶点。

弦歌骤断 讲学冰封时刻的坚守

万历七年(1579年)正月,原任常州知府施观民,以科敛民财、私创书院定罪,被革职闲住。当月二十二日,张居正下令毁天下书院,施观民所创书院及各省私建者,全部改为公廨,粮田查归里甲,不许聚集游食,扰害地方。至万历九年(1581年)十月,应天等府书院共六十四处,或改公署,或给原主,或行毁废。

禁毁书院,使得私人聚徒讲学失去依托,学界一片风声鹤唳,许多讲学者“相勉慎勿讲学”,规模庞大的讲会顿时销声匿迹,宋代以来蔚然成风的书院讲学,在铁腕宰相的强力打压下,戛然而止。

此举更加剧了张居正与士林的矛盾,当禁毁令传到广东,首辅另一得意门生,广东巡抚刘尧海颇不以为然,摇头叹曰:“此非盛世事”,张居正由此又背负不学无术、文化专制的恶名。

福建巡抚耿定向是少有的支持张居正的理学名臣,他致信张元忬,字里行间倾注着真挚的情感。他竭力为张居正辩护,认为



张相为政宗旨在于上臻安富尊荣之效,下承孝悌忠信之风。他秉持敦本务实的行事风格,整顿的是虚浮散漫的学风世风。

耿定向对张元忬倾吐衷肠,自谓自己研究学问,现在才切身体会到张居正才是真正领悟圣贤之道,堪与古代名相伊尹、周公媲美。他批评世俗之人对讲学的误解,强调讲学的真正目的在于提升个人修养,营造优良的社会风气,而非简单的口头宣扬或树立徒党。因此,他为首辅被世人误解而蒙受骂名深感惋惜,希望借助张元忬在士林中的威望,请他出面消除清流对张居正的误会,上调君相,下联士心。

张元忬认同乃师“崇本实而抑虚浮”的为政方针,但也委婉批评毁书院政策不免有矫枉过正之虞,“熙明之朝而禁论学,此忧道之士所为扼腕叹息”。

张元忬和邓以赞皆以讲学闻名,隆庆年间,张居正屡召二人“昂以问学,孳孳甚殷”;及至万历初年,学禁渐严,张居正遂劝张元忬转攻诗文之道,遭到婉拒,可见张元忬的讲学初心从未动摇。在禁毁书院致使各方矛盾激化、讲学之风日衰的艰难时刻,张元忬依然秉持对学问的赤诚,坚守本心。

终张居正之世,张元忬与乃师虽有理念上的分歧,但双方尚能保持和谐关系,未起波澜。

张居正以一代宰辅之尊,通过主掌科举、执鞭国子监等途径广植桃李,在朝堂编织起一张盘根错节的政治网络。这位身负经世之才的相门高足,始终在改革激流与清议风标之间走索平衡,将师门恩义与朝堂纲常置于天秤两端。他既是新政推行的中坚柱石,又成为道德困境中的踟蹰者,其进退维谷的仕途轨迹,折射出晚明士大夫在权力漩涡与儒家理想之间的集体困境。当改革锋芒遭遇道德铁壁,张元忬们的身影便化作时代剧变中最耐人寻味的注脚,演绎出晚明士大夫群体的命运浮沉。

本报综合消息